

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一种外交哲学视角

随新民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具有很强个性化特色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以传统文化内涵的哲理、和合精神为核心,兼容并蓄了异域思想之精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共同发展思想都内涵丰富的哲理。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时代精神的展示。周恩来外交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关键词: 周恩来外交思想;传统文化;和合精神;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中图分类号: K827.7=73;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6)02-0077-07

促进和平合作、共谋发展繁荣、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绝非仅仅是中国为了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做的一种姿态或者政策宣示,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内涵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合精神。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再次印证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同世界分享发展的事实,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还是存有疑虑,更有甚者谓“中国威胁”。显然,中国外交战略内涵的“内圣外王”之道并没有

为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认同,因此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古训三者缺一不可。“立言”——从哲学层面来阐释中国和平外交思想——是解释中国和合精神传统、说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平抑并消除外界疑惧或“中国威胁”的重要途径。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鉴于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巨大影响和在国际社会享有的声誉,研究周恩来的外交哲学思想在学理上是对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外交哲学研究成果的补充,在实践上有利于国际社会对

收稿日期 2005-03-18

作者简介 随新民,男,外交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冯友兰先生在论及中国哲学之弱点时说:“中国思想家大多没有以拥有知识自身为最高境界,而是把知识作为晋阶的资本,即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中国哲学家们多没有逻辑缜密的思想体系。只有那些“不能实举帝王之业”、推行圣人之道者才不得已退而“立言”。所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这里需说明两点:一是用“说明”代替在西方有贬义内涵的“宣传”措辞,是借鉴赵启正先生的观点,详见其论文《努力建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二是我们“解释”和“说明”的对象是因不理解而对产生疑惧和忧虑的群体,至于那些基于偏见的恶意诋毁者、谣言制造者,我们完全可以不屑一顾。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范文的《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2002年第6期)和《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时殷弘等的论文《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和《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门洪华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郭树勇的《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哲学的变与不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周雷和刘云的《中和:我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思维中的传统哲学方法论底蕴》(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至于周恩来外交哲学的研究,只有裴默农著的《周恩来外交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的第三章有所涉及。

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理解和营造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笔者才疏学浅,既无力系统地论证周恩来外交哲学,更不奢望探究博大精深的中国外交哲学渊源,这里只是从哲学视角谈些许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粗浅看法。

外交哲学的属性

除了极个别论者外,有关研究都是以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为基础的,即学术共同体认同某种外交哲学概念,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无需陈述和验证。本文既不怀疑外交哲学存在属真的命题,也无意探讨外交哲学的学科性问题,只是对外交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略作工具性的说明,以便于后续的分析表述。

既然是外交哲学,那么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认识论(epistemology)等范畴都适用于外交哲学。外交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交行为主体与外交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鉴于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最基本的行为体,具体地讲,就是作为外交主体的国家与客体——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依据黑格尔的逻辑,处于“自在自为的应然状态”的国家是结成的关系也是“应然”的,国家之间一旦建立起某种哪怕是“共存”的关系,就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争端和冲突,如何实现“共处”?如何解决“争端”?是“王道”还是

“霸道”?诸如此类就成了以政治精英为代表的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任何一种选择的背后都有着价值信仰的支撑。正是这些价值信仰或者观念构成了外交哲学的具体内涵。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折射出外交哲学思想的分野。在中国,既有基于先秦诸子提倡的修身、仁爱、中庸、信义、兼爱交利(爱人利人)、内圣外王等而形成的和合精神,也有吸纳而来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西方,既有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也有洛克的竞争且生存逻辑,既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倡的主权国家“自为排他性存在”理念,也有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中基于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而提出“世界政府”的理想,既有马恩有关“世界历史观”和“交往理论”对外交研究和实践的启示,也有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精华。

外交哲学的稳定性与外交政策的可变性。相对于具有“与时俱进”属性的外交政策之多变性而言,外交哲学思想则具有“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和稳定性。因为一个民族在对外关系的舞台上如何动作,是同它的成长史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9] (p.5)}。这种稳定性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是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外交信奉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前几年就此展开的一场小规模争论就是这种两难选择在学术界的折射。研究周恩来的外交

范文就属于极个别之列,他提出了外交哲学能否作为元哲学的分支学科问题,他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做了初步的验证。参见范文:《论外交哲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第57-60页。

陈乐民先生对所谓的“应然”做了说明:“应然”就是国家之间建立关系是出自需要而理所必至的,有关国家并不是事先根据某种法或某种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才结成一定关系的,在本质上讲,他们相互之间并不承担任何道义上的义务。详见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20页。

参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5-347页。

所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提法。这里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争论肇始于《战略与管理》刊发喻希来和吴振辰的名为《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文章(1998年第2期)和张睿壮以题为《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一文(1999年第1期)的评述,后又有前者的回应——《外交哲学中的人类道德——答张睿壮先生》(1999年第2期)。后来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中日关系“新思维”(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或“外交革命”(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张睿壮发表了《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3期)一文,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前一次争论的继续。

思想想必能够为我们带来启示,因为其外交思想就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博采众长的异域精华,并且构成了其最具魅力的外交哲学理念。

周恩来不仅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而且还在会见外宾时专门做了阐释和发挥。我们办外交的“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1](p.327)}因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不能超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强调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崇尚理性的自觉。”^{[9](p.8)}孔子提出仁知统一学说,认为伦理学与认识论是统一的。“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以理性原则为依据,真正的道德行为是自觉的,而这种自觉性来源于理性的认识,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修养成为有道德的人。”^{[9](p.8)}儒家经典不仅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而且把“正心”和“修身”视为实现后三大理想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就有了“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欲修身者,先正其心”^{[9](pp.1-8)}。《墨子》在这方面也不乏精辟的论述,认为修身系人生之必然。当然,此“修身”最为重要的是内心世界的修养与升华,因此也就有了“哀莫大于心死”之说(《庄子·田子

方》)。“修身”至少有三个层次内涵:修己以敬业,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无不涵盖其中。最高层次的“平天下”思想,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谋世界之和平稳定、求天下之发展繁荣。有着极深传统文化素养的周恩来,身居其中,耳濡目染,其言行举止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传统的烙印,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周恩来精神”。就外交而言,维护世界和平就是周恩来“平天下”世界观的实践形式。

同西方偏重“分二”(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哲学思维更趋于“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体用合一”),从而造就了中国的“和合”人文精神。所谓“商契能和五教”、“礼之用,和为贵”、“中和”

合适不过的载体。周恩来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对它进行改造,使之得以发扬光大,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其革命生涯与外交实践中反映出来。如《荀子·修身》所说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的“诚”,在周恩来看来还应再加上《易经》强调的“谦”,“仁、谦、诚”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所以说,周恩来精神并非仅源于儒学一家,而是整个民族文化精华的浓缩与整合,并用来指导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如他在外事谈话中引用的“见机而作”、“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引而不发”、“后发制人”、“有备无患”、“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针锋相对”等等,其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饱含着丰富的传统哲理。

马克思主义与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既是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主流思潮之一,新中国成立更是成为一种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但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转变过程则是在欧洲留学期间完成的。周恩来1920年到法国后钻研比较了各种学说,对法、德、英等国做了实地考察,加速转变进程。在致李锡锦等人的信中,周恩来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快地要它为它宣传奔走。”^{[2](p.46)}在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经立于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2](p.60)}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周恩来在致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2](p.20)}这些足见在留法之初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旅欧期间撰写了一系列反映国际时事的通讯,这是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国际研究的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运用

提高了他洞察事务、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形成其研究分析国际事务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日后的外交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是周恩来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后国际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主权平等、矛盾运动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普遍原理指导我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具体产物。从建国之初外交领域的四大战略决策到60、70年代的相继调整,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倡导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提出,从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到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从在一般涉外活动中的言行到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举措等等均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有关国际战略理论同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周恩来在直接领导外交工作的26年中,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并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新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赢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与胜利。从方法论讲,周恩来的外交遵循的是矛盾分析法,即分析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不同时期外交政策和外交斗争的策略。

西方的进步思想与周恩来外交思想

和合精神是周恩来精神中最具特色的因素,这种精神在对待人类文明问题上表现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周恩来“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周恩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信仰共产主义,丝毫不排斥西方诸如“自由”、“民主”、“平等”等进步思想。“五四”前后启封建文化之蒙的新文化运动,其主流是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学说,这对适值求学时期并胸怀远大志向的周恩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旧民主在旧世界里也是好的,旧民主初

对此,钱其琛在《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一文中也有分析阐释。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这是《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周恩来的评价。讲话还正式提出“周恩来精神”的概念,参见《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3期第1页。

期还有点民主,如国会选举等”。“争取有一些民主总比完全没有好”^{[11](p.154)}。周恩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合理内涵同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通过融合、调和形成独具特色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其他诸子思想和西方进步思想为补充的周恩来的伦理治国理念,他同时又非常重视社会实践,提倡社会调查的施政方法,努力做到伦理规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既以具有永恒价值的中国先哲的道德格言律己,如“克己恕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等,又倡导“哲学的思想和科学的能力”行事准则,主张用西方极富进取精神的进化论学说改造道家思想中消极无为成分。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使中国人从娘肚子里一出生就没有民主。”^{[12](p.139)}因此,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实现民主共和一直是周恩来认知中“大同社会”的重要内涵。延伸到国际体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均有体现,这或许就是文明共性所在。1955年在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上,周恩来提出的“五面旗帜”中就包括“民主自由”。“我们要高举和平、民族独立、爱国主义、民主自由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1](p.149)}。至于平等问题,周恩来面对的无论是大国、强国或是小国、弱国,都充分印证了其性格中内生的平等思想。当双方存在争执分歧时,“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1](p.327)}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其外交思想内涵哲理的展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形成独具个性魅力的周恩来外交思想。

和平共处,融和合精神与异域思想精华于一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或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同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0](pp.26-27)}。冲突在重建结构、秩序、方式的过程中完成整合。“和”的古文形体为“龠禾”,左旁为乐器,右旁为声符,系源于“礼乐”。《中庸》有“发而皆中节谓

之和”之论;《郑语》有“和六律以聪耳”之道;《庄子》有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说;《易经》则强调天、地、人三界靠“和”来协调融合^{[10](pp.57-61)}。所有这些反映的都是“天人合一”、“和衷共济”、“和为贵”的思想精髓,强调的是“有形相”与“无形相”整合再生过程的“和谐与共生”。“和合”成了一种最高境界,也是“和平共处”原则之“根”,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之“元”。

从政治信仰的认同层面和国际政治环境视角考量,列宁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和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思想无疑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影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是列宁新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即“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国家则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3](p.75)}。这时,列宁已经认识到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国际体系也将会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并存的局面。列宁还一再强调“革命不能输出”,就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而言,它必须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便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外,列宁在进一步分析阐述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时提出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把“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并在外交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这一思想。1954年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补充完善了恩格斯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想,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就其层次而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三个方面——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底线,再加上强调经济利益层面的“平等互利”就使和平共处思想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作为普遍适用的

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简洁而精辟的概括。周恩来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勤于观察思考,善于在对立中寻找一致,以期克服或减少对立,消除或平抑分歧,扩大共识。

在中国传统哲理中,“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的正是这种差分,《易经》的“太极”和张载推行出的“太和”都是基于“异”的存在。无论“太极”还是“太和”都是关于“异”和“同”关系的思辨。这里“同”或“一”的内涵是“和合”,而非“去异”的过程,强调的是“和谐”与“统一”。

实践“求同存异”既需要真诚,又需要耐心。周恩来究其一生都在实践着“求同存异”原则。就新中国外交而论,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做了具体地阐释:“处理涉外分歧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方法是等待对方觉悟……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这是中国办外交所坚持的重要哲学思想。“求同存异”不仅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领域的差异,而且即使在上述方面一致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具体的利益差别,所以求同存异要求各国求“大同”(即共识)、存“小异”,以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合作发展的目标。

互谅互让:协调中和思想的实现形式

协调中和是周恩来在中学时代就已形成的一种思维风格,在给谏小岑夫妇的信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自己性格特征,即“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2] (p.40)}。实践证明,周恩来性格中的调和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俗的调和与折中,而是“立足于更高的视角去综合各种观点之所长而形成的独到见解”^{[3] (p.462)}。它源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却超越了中庸之樊篱,达到了更高的、积极的中和境界,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周恩来在回顾总结民族革命时期统战工作经验时进一步提出了协调关系的三大原则: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忍让。这些原则拓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则表现为平等对话、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共同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思想的逻辑延伸

“共同发展”思想很少有人提及,似乎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体系的缺失。的确,我们很难在周恩来的言论中找到“共同发展”的措辞,但这与有没有“共同发展”的思想因素不属于同一范畴。在周恩来时代,全球化远不像今天这样发展迅速而且势头强烈,国际体系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分裂的,而且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头等大事。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忽视国际交往中的经济因素,所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平等互利”一项。首先,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际间经济合作还主要表现为贸易往来的事实,“平等互利(互惠)”和“互通有无”就是周恩来“共同发展”思想的外显形态,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其次,从形式逻辑来看,如果我们把“平等互利”的内涵稍加推衍,那么周恩来外交思想中具有“共同发展”理念的命题也是成立的,因为“互利”就是意味着参与各方都能获得收益。再者,“互利”本身也内含着“共同发展”的成分。

人类需要和平与安全,更需要发展与进步。相对于其他方面,“共同发展”是超越和平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讲,“和平”仅仅是“共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共同发展与人类进步才是国际社会所应承担的更为崇高的使命。1954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的谈话就包含着“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念。中日之间需要“共存共荣”,“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1] (p.89)}。

关于互通有无和平等互利,周恩来多有论及。如,“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通国外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他们的消费市场……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1] (p.51)}在解释说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 (p.20)}“我们亚非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的独立

依据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正蒙·太和篇》——“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业,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之中的“一”是“太极”,而“一物两体”之中的“一”则是“太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30页。

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人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1](p.118)}在论及中日经济合作时,周恩来说:“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1](p.413)}

结束语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时代精神 ——构建和谐世界

基于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际体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4]。这是以“和合精神”为底蕴的、建立“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自然延伸。就外交层面来看,周恩来外交思想不仅扮演着承前启后的角色,而且对我们努力建构“和谐世界”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时代精神的体现。

周恩来外交思想内容丰富,内涵哲理深刻,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以民族传

统文化内涵的哲理为底色、兼容并蓄异域思想精华、极富有个性化特色的周恩来外交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 [1] 周恩来外交文选[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 周恩来书信选集[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3] 裴坚章.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 [4] 裴默农. 周恩来外交学[M].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 [5] 刘焱.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 [6]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8] 冯契. 中国哲学通史简编[M]. 上海:三联书店,1991.
- [9] 南怀谨. 原本大学微言[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10] 张立文. 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11] 陈乐民. 西方外交思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12] 彭明. 五四运动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3] 列宁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4] 胡锦涛. 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2005-09-16.

(责任编辑 严瑾)

Understanding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fro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SUI Xin-m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wo sources, i.e. the first source consis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harmonious spirit at the core of his thoughts; the second comes from ess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Of all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co-existence,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keeping aside difference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which embody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deas can show Zhou En-lai's style of diplomacy. Zhou's thoughts on diplomacy was blend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idea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 initiated in 2005 is, to a large extent, the reflection of Zhou's diplomatic thoughts. Therefore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belong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Chinese cultur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keeping aside differences; co-existence